

# 四十年代自由主義學人 理想中的經濟制度

## ——以《新路》周刊為例

• 衛春回

研究40年代中後期自由主義者的思想狀況，《新路》周刊是頗具代表性的重要史料。1948年3月，北平成立了一個由北大、清華、燕京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的著名教授、學者組成的學術研究團體——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該會的唯一活動便是於5月出版了以宣傳中間路線為宗旨的《新路》周刊。與創辦較早的著名中間派雜誌《觀察》、《世紀評論》等相比，《新路》周刊是不失其特色的。從編輯和撰稿人來看，不僅有一些常在上述雜誌發表文章的知名人士，還吸收了大量三四十歲的青年學者，他們均有多年留學英美的教育背景，大都獲得了博士學位，是各學科學有專長的專家。《新路》所刊載的各類文章非常注重學理性和研究性，對一些專門問題作了相當有系統的討論，表現出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探討精神。《新路》還注意挖掘展示多種不同的觀點，為學者暢所欲言營造了寬鬆的氛圍。應該說，《新路》雖創辦甚晚，但其超然獨立的態度和頗具分量的文論，使其在眾多的中間派刊物中脫穎而出，

迅速引起了廣泛關注。當然，在國共非此即彼的激烈鬥爭中，《新路》及其同類們的處境只能是尷尬的。據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和《新路》雜誌的創辦者錢昌照回憶：「辦了這個刊物，進步人士乃至共產黨人指責它阻撓革命，而國民黨方面認為是『反革命』言論。」①「香港方面的保守和進步輿論都對它不滿。而蔣介石則橫施壓力，先是嚴重警告，12月30日國民政府社會部又勒令其停刊。」②《新路》實際上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它的命運乃是中間道路在中國特定環境下難以為繼的又一佐證。本文試圖對《新路》有關經濟制度選擇的討論作一點梳理研究，希望從一個側面展示中間道路的社會理想，同時也幫助我們恢復一段已被忘卻或扭曲的思想歷程。

一

何種經濟制度更加符合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新路》撰稿人極為關

1948年3月，一批著名教授、學者在北平成立了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該會出版了以宣傳中間路線為宗旨的《新路》周刊。但在國共非此即彼的激烈鬥爭中，《新路》的處境尷尬。據雜誌創辦者錢昌照回憶：「辦了這個刊物，進步人士乃至共產黨人指責它阻撓革命，而國民黨方面認為是『反革命』言論。」

何種經濟制度更加符合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新路》撰稿人極為關注的問題。他們討論最多、分歧也較大的是：與公有制相匹配的，究竟應該是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市場價格體系。吳恩裕認為，計劃經濟是人類發展的趨勢，是符合人類本性的最優選擇。負生認為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建立的兩個基本條件，互為表裏不可分割。

注的問題，他們對此展開了深入細緻的探究。發表過重要文章的作者主要有著名社會學家吳景超、青年經濟學者蔣碩傑、劉大中、陳振漢、徐毓柵以及青年政治學者吳恩裕。此外，參加討論的還有經濟學者翁獨健、戴世光、藤茂桐、趙守愚，著名記者蕭乾等。

各種視角的論說首先是圍繞着所有制問題展開的。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幾乎所有的自由主義者對生產資料公有制都持贊同和認可的態度。在他們看來，一個合理的經濟制度應該「使社會總生產的分配盡可能趨於平均。俾使社會所有人士自一定的總生產中能獲得之滿足之總和臻於最大」<sup>③</sup>。這種「經濟平等」的要求，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之上。在此前提下，《新路》學人討論更多、分歧也較大的是：與公有制相匹配的，究竟應該是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市場價格體系。

一部分學者主張實行計劃經濟。吳恩裕認為，計劃經濟是人類發展的趨勢，是符合人類本性的最優選擇<sup>④</sup>：

人有個性，也有社會性。不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人必得和旁人合作及分工；而改進個人的生存，尤其需要高度的合作與細密的分工。這種高度的合作與分工的社會就正是所謂「計劃的」社會。因此，「計劃的」社會乃是人性的要求。這要求，在理論上可以有充分的證明；在事實上也即將逐步的證實。

吳氏強調人所具有的社會性，以及人與人之間必須實現分工與合作的現實，而能夠滿足這一事實的只能是集

體的、自覺的、有計劃的經濟體系。趙守愚也指出：「計劃經濟在今日不僅是辦法和制度，並且是推進經濟生活的公認工具」<sup>⑤</sup>。

陳振漢從效率角度分析計劃經濟的可行性。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的計劃制度下，雖然生產因素的客觀市場不再存在，但理論上計劃當局仍能夠根據所謂價格的變數作用，把生產資源派分到各種生產事業裏去，達到與理想的價格制度媲美的效率。從實踐看，蘇聯的計劃經濟也可證明，要做到供求平衡並不是件困難的事。因此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生產，計劃經濟是比價格機制更有效率的一種選擇。「如果生產資源公有，利潤動機消滅，只靠客觀的價格市場，以派分資源，配合因素，所達到的效果或遠不如有一個綜核平衡的中央機構，根據主觀的價格判斷來得圓滿。」<sup>⑥</sup>

以負生為筆名的作者則更多地從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的關係來探討計劃經濟的必要性。他認為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建立的兩個基本條件，它們互為表裏不可分割。很難想像與公有制配套的不是計劃經濟，因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公營本有兩種意義：一個是取消私產。達到這一點只要把生產公有公營即可，也許可以不必牽扯到『計劃』的問題。但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公有公營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即要取消貧富不均現象，這就非常要公道的平均的分配不可。而這種分配方法當然與生產息息相關。如果生產毫無計劃，欲求有效的公道平均的分配，如何可能？」<sup>⑦</sup>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落腳點在於分配，社會主義的生產之所以需要計劃，是為了在生

產方面實行照顧到全局的通盤計劃，以確保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性平均分配，否則「公有公營的意義，也喪失殆盡了」<sup>⑧</sup>。

可以看出，幾位學者對計劃經濟的強調是各有側重的，人類分工合作的角度是最一般意義上的闡釋。對效率的比較，則明顯受到現代數理經濟學的奠基者帕羅托 (Vilfredo Pareto) 以及社會主義學者蘭格 (Oskar Lange)、泰勒 (Fred M. Taylor) 等人的影響，他們都強調科學化的計劃是可以達到與市場經濟相媲美的效果的。而分配角度的分析，更具有道德評判的意味，其中有頗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痕迹。無論何種角度的論證，計劃經濟都是與公有制相配套的一種理論模式。這種具有「預先糾錯」功能的經濟模式，從理論形態上看似乎很理想，但它最大的問題是完全排除了消費者主權或更廣意義的效用主權，這正是另一部分《新路》學人反對計劃經濟的重要理由。

## 二

與上述不同的另一種觀點值得我們特別關注，這就是以吳景超、蔣碩傑、劉大中、春生等為代表的《新路》主流派的觀點。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目標除了取消私有財產以外，「還有『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社會主義並不是要大家貧窮困苦，而是要剷除貧窮困苦，要給社會全體組成員造成豐裕和文明的生活。』」<sup>⑨</sup>達到這一目標的理想經濟制度應該是公有制與價格機制的結合，而不是與計劃經濟的聯姻。因為與價格機制相比，計劃經

濟的弊端是明顯的，吳景超與春生將其歸結如下：

第一，計劃經濟妨害人民的消費自由。所謂消費自由是指消費者有能力影響商品的生產。「消費者選擇的自由，只有在他的選擇，可以影響到生產因素的分配時，才算是完全實現的。」<sup>⑩</sup>在價格體系下，生產元素的配給是無形的、間接受消費者指揮的。而計劃經濟的特徵是由國家設計機關的少數人來決定生產甚麼產品，這顯然不是真正意義的消費自由。

第二，計劃經濟限制了擇業自由。在自由經濟的條件下，人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政府沒有任何規定防止其轉業。計劃經濟卻做不到<sup>⑪</sup>：

在計劃經濟下，每種重要物資的生產，已由計劃決定。則生產此種物資的勞力，勢非與之相符合不可，否則計劃便無法完成。我們因此可以想像，計劃經濟是無法容許擇業完全自由的，因為在完全擇業自由的狀態之下，每一實業，或某一工廠，所能得到的勞工，其數量決不能與計劃所必需的數目相吻合。

第三，計劃經濟無法達到生產因素的合理分配。按照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原理分析，最合理的生產因素分配，只有在完全競爭的價格機制下才可以運作。而計劃經濟的情形卻與此相背<sup>⑫</sup>：

在計劃經濟之下，對於任何生產因素（資本、勞力或土地）的利用，因為係武斷的，所以不能恰到好處。他對於生產因素的利用，可能發生兩種結果，一為利用不足……一為浪費……

反對計劃經濟的《新路》學人認為社會主義的目標除了取消私有財產以外，還有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達到這一目標的理想經濟制度應該是公有制與價格機制的結合，而非計劃經濟。因為計劃經濟有以下弊端：第一，妨害人民的消費自由。第二，限制擇業自由。第三，無法達到生產因素的合理分配。第四，必然會產生計劃的浪費。

利用不足與浪費，對於人民的生活程度，都有不良的影響。

第四，計劃經濟必然會產生計劃的浪費。比之自由經濟，計劃經濟增加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計劃機構，為促使各生產單位完成計劃，還必須配有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考核機構。這兩套機構的人員數目相當可觀。「假如沒有這一些人的存在，生產工作依舊可以進行，那麼國家僱傭這一些人，完全是一種浪費，對於人民，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sup>⑩</sup>

由上可見，計劃經濟不僅完全忽略個人的喜好和特點，無法合理配置生產因素，而且增加了不必要的經濟運行成本，因而它是既無自由又無效率的。有鑑於此，社會主義與價格機制的結合便成為自然的結論。這種認識的基本前提是兩種經濟形式可以與不同的所有制組合搭配，也就是說，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是可以分開的，兩者並沒有必然的聯繫<sup>⑪</sup>：

在社會主義之下，可以不必有計劃經濟，而在其他主義之下，也可以有計劃經濟……所以海耶克(F. A. von Hayek)曾說過：我們可以有很少的計劃，很多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很多的計劃，與很少的社會主義。由此可見這兩個範疇，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是不必拉在一起的。

究竟如何使公有制與價格機制結合起來，持該種主張的數位撰稿人也對此做過若干設想。最重要的是在將私有財產轉變為公有財產的過程中，大的生產單位依舊維持公司的形式。公司董事會人選，一小部分由政府委

派，其餘大部分由不同社團舉出<sup>⑫</sup>：

每一生產單位中工作的人，與該單位的董事會或董事會所指派的經理，發生契約關係，不與政府任何機關，發生契約關係，因而生產單位中的工作者，既非政府所僱傭，也不為政府所解僱。這是保證私人就業，不受政府干涉的辦法，也就是分裂政治權與經濟權的方法。

公司的生產方針，雖不以贏利為目的，但要依照政府所指示的完全競爭下的生產原則進行。至於在新投資方面，政府在徵得人民同意(通過國會的立法)下，可以利用強迫儲蓄的方法，增加資本的蓄積；也可制定一個資本的積累率，但不應規定新資本的用途：「假如政府以新資本交給銀行，而讓人民或公司出相當的利息(此項利率，必須使新投資等於新儲蓄的數量)來利用這些資本，那麼人民的消費主權還可充分行使，便非計劃經濟了。」<sup>⑬</sup>這些具體的辦法和措施，完全是他們對公有制下市場經濟運作的一種理想化設想。

總之，這一部分的《新路》學人認為，計劃經濟與價格機制只是一種手段和方法，它可以與不同的所有制搭配。最理想的組合是公有制與價格機制相結合，實行所謂的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春生的總結很具代表性<sup>⑭</sup>：

生產事業私有而有計劃，是極權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事業公有而有計劃，是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生產事業公有而無計劃，是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我是贊成自

一部分《新路》學人認為，公有制與價格機制相結合是最理想的組合，實行所謂的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春生的總結很具代表性：「生產事業私有而有計劃，是極權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事業公有而有計劃，是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生產事業公有而無計劃，是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我們要社會主義，但不要計劃經濟。」

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因為在這種經濟之下，階級的現象取消了，貧富不均的情形改善了，奢侈與失業的對立不存在了，同時還維持着消費者選擇的自由，與勞動者就業的自由。我們應當擇善而從，所以我們要社會主義，但不要計劃經濟。

將公有制與價格機制融為一體的制度設計，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均沒有前例可循，因而具有更強烈的探索價值。

### 三

上面我們基本了解了自由主義者所嚮往的經濟制度，從中大致可以看出以下一些重要的思想傾向和特徵。首先，他們對社會主義抱有普遍的偏好，無論是主張計劃經濟還是提倡價格機制，其實都將實現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前提予以確認。解讀這種普遍的思想傾向，需要對中國自由主義的成長歷史以及世界潮流的發展態勢做一些考察。眾所周知，二十世紀是社會主義潮流洶湧澎湃，同時傳統的自由主義面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開始各種各樣修正的時期。「五四」時期中國引進的自由主義，便多是「修正型」的。其中具有某些社會主義色彩的修正，尤得自由主義者青睞。比如美國杜威 (John Dewey) 的民主自由主義、英國費邊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中國學人之所以普遍具有社會主義情結，在筆者看來，有兩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這種主張與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有相對容易的結合點，中國的大同學說和平等平均的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對中國士人

形成根深柢固的影響。近代以來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最能應對這種心理，因而知識份子大多對社會主義抱有好感，即使是深受英美文化熏陶的自由主義者，也很少公開宣稱自己擁護資本主義，而將社會主義視為某種具有終極意義的社會烏托邦。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現實中政治與經濟的極端不公正，使他們深刻感受到改變現實的緊迫性。可以說，中國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興趣決不單純是學理上的，他們更熱衷的是解決現實社會問題，提供一個全方位的社會改造方案始終是他們的關心所在。顯然，呈現出種種弊端的資本主義及與之為伍的傳統自由主義學說，無法為中國現實境況的改進提供足夠的道德與倫理依據，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模式和時代潮流，其理想和前景都是

中國學人之所以普遍具有社會主義情結，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的大同學說和平等平均的民本思想源遠流長，而社會主義主張最能應對這種傳統心理。其次，二戰以後，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和工黨執政引起國際社會廣泛注目。當時英國費邊社成員拉斯基(圖)成為中國學人仰慕的大師。



中國社會現實中政治與經濟的極端不公正，使中國自由主義者更熱衷的是解決現實社會問題。顯然，呈現出種種弊端的資本主義無法為中國現實境況的改進提供足夠的道德與倫理依據，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模式和時代潮流，其理想和前景都是充滿誘惑的。

充滿誘惑的。正是基於傳統與現實的雙重因素，中國的自由主義學人幾乎無人能跳出對社會主義理想的憧憬和讚賞。

其次，作為自由主義者，他們尤為關注當時在歐洲特別是英國流行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並深受其影響。二戰以後，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和工黨的執政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注目，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更是興趣盎然。當時在英國頗有影響的工黨著名理論家、費邊社成員拉斯基 (Harold J. Laski) 成為中國學人仰慕的大師。20至30年代有不少中國學子慕名到他長期執教的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學習，受業其門下。中國自由主義陣營中的若干中堅人物，如羅隆基、王造時、儲安平等均受業於該師<sup>⑩</sup>。《新路》創辦人錢昌照1919年10月考取該院，其導師便是拉斯基<sup>⑪</sup>。在《新路》主要撰稿者中，30年代曾就讀於該院的有龔祥瑞、吳恩裕、樓邦彥、王鐵崖、蕭乾、藤茂桐、胡寄窗、蔣碩傑等人，其中龔祥瑞、吳恩裕直接師從拉斯基，他們的畢業論文都曾得到拉斯基親自指點<sup>⑫</sup>。由此可見，《新路》撰稿人與拉斯基和民主社會主義有着教育背景上的淵源。

當然，師承關係所反映的更深刻內容是拉斯基的主張與中國自由主義者內心渴望的契合。從大的方面說，拉斯基的思想主要是：在自由主義的基本框架內，將社會主義的平等公平原則融合進來，實行一種既保留資本主義民主制，又吸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新制度，他稱之為「計劃化民主國家」。這種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兼而

有之的社會理想與中國自由主義者對完美社會的追求非常合拍。尤其是民主社會主義在經濟領域對自由主義的修正，使對經濟不公平深惡痛絕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感到歡欣鼓舞。「只有在政治民主之外再加上對生產資料使用的社會控制以及為整個的社會利益調控經濟發展和財富分配的時候，這樣一個社會才能實現。」<sup>⑬</sup>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在經濟制度的選擇中，他們普遍贊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並有不少學者主張國家統制下的計劃經濟，希望通過實施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來達到經濟平等的目的。

再次，上述經濟制度討論中，我們所發現的另一種傾向是非常耐人尋味的，這就是主張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和價格機制結合的學者，他們的選擇顯然受到了當時並不走紅的新自由主義影響。1944年，經濟學家兼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發表了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充滿激情地抨擊了國家對市場機制自由運轉的一切限制，認為這些束縛之所以應被廢止，是因為它們同時對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構成致命的威脅。哈耶克的矛頭直指英國工黨所號召的民主社會主義，並認為這種溫和的民主社會主義儘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勢必導致與德國納粹相同的災難：現代奴役制。《新路》學人中具有同樣關注傾向的有蔣碩傑、吳景超、劉大中、春生等人。蔣碩傑是當時《新路》撰稿人中最年輕的，40年代在劍橋攻讀博士時，其指導教授便是哈耶克；吳景超是資深社會學家，20年代留學美國，獲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劉大中於40年代獲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sup>⑭</sup>。他們

在經濟制度的選擇中，雖然也表現出頗多的通容與折中色彩，但在公平、效率、平等、自由諸種存有緊張與矛盾的價值中，堅持效率、尤其是自由原則的不可替代性。吳景超說<sup>23</sup>：

人類不要輕易放棄其自由。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制度，其保護人民消費自由的能力，勝過價格機構。所以我不願意看到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聯姻，而願意它與價格機構百年偕老。

需要特別關注的是，這些自由主義學人已充分認識到經濟制度的選擇決不單純是經濟問題，而是與民主政治休戚相關，這方面他們所具有的洞察力似乎與哈耶克一脈相承。蔣碩傑在一段有關社會主義經濟與政治的分析很能說明問題<sup>24</sup>：

在全面的社會主義下，生產事業盡屬國營，全國的就業人員，除極少數自由職業者外，盡屬政府之公務員和僱員。有野心的政府利用之以控制全國人事之黜陟。在集體的計劃經濟之下，則一切商品之生產與分配以及生產因素之配布，更無不在政府統治之下。如此龐大的權力如何能防止其不被濫用？英儒艾克敦(Lord Acton)嘗謂「權力必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然則社會主義下政府之經濟統制大權，能不使統制當局腐化否？這是決定經濟制度時必須慎重考慮的大問題。……我們放眼看看所有過去及現在實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或集體統制經濟的國家，何以都沒有健全的反對黨存在，就可以明瞭這決不是偶然的現象。健全的反對黨的存

在，亦即民主政治的存在，需要人民在政府所控制的機關之外，另有謀生及發展之途徑。

這就是說，如果政府控制了人民的飯碗，就意味着控制了人民的一切，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實行市場經濟與價格機制，不僅是經濟制度本身的問題，也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基礎和條件，否則「也不敢保險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不出一個拿破崙或希特勒。他可以鞏固城防為名，或以保衛某種主義為名，把一國的資源，用在窮兵黷武方面。這種不幸的可能，是任何社會所不能不預防的」<sup>25</sup>。所以在追求經濟平等時，萬萬不可放棄民主政治的建設，這是自由主義者選擇經濟制度時最重要的出發點之一。

《新路》學人對經濟制度的討論，折射出當時世界潮流以及中國傳統與現實狀況對他們產生的深刻影響。與早期自由主義者只關心都市知識份子的政治不自由相比，40年代中後期自由主義學人對經濟問題的關注度明顯提高，他們對經濟民主的要求切中現實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正的時弊，體現了社會底層要求經濟平等的願望，表現出更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此相應的是如何處理經濟平等與經濟自由、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關係問題。應該說，在強調通容的前提下，他們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傾向，主張計劃經濟的人，更注重公平與平等原則，以至於「在兩種民主不可兼得的今日，一碗飯比一張票實惠的太多了」<sup>26</sup>。而持另一種傾向的人，更強調自由的重要，或者說他們決不放棄自由與民主的價值底線，這使他們的主張帶有更多的理想色彩，在邏輯與現

《新路》學人中，蔣碩傑、吳景超等人注意到，如果政府控制了人民的飯碗，就意味着控制了人民的一切，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蔣碩傑曾說：「社會主義下政府之經濟統制大權，能不使統制當局腐化否？這是決定經濟制度時必須慎重考慮的大問題。」

主張計劃經濟的《新路》學人，注重公平與平等原則，以至於「在兩種民主不可兼得的今日，一碗飯比一張票實惠的太多了」。持另一種傾向的人，更強調自由的重要，他們基於保障公民自由權利與民主體制而對國家統制式計劃經濟的懷疑和反對，已被事實證明是非常敏銳和有見地的。

實中也存在更多難以調和的矛盾。但無論如何，他們基於保障公民自由權利與民主體制而對國家統制式計劃經濟的懷疑和反對，已被事實證明是非常敏銳和有見地的。這些充滿探索的思想財富，對今天乃至未來現代化道路的選擇都具有重要的借鑑價值，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坎坷後，我們十分需要以清醒和理智的態度重新對待這份被遺忘已久的自由主義的珍貴遺產。

### 註釋

①②③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頁89；101；11。

④⑤ 蔣碩傑：〈經濟制度的選擇〉，《新路》，第一卷第三期（1948年5月29日），頁7；10。

⑥ 吳恩裕：〈由人性上證明計劃社會的必要〉，《新路》，第一卷第九期（1948年7月10日），頁12。

⑦ 趙守愚：〈經濟自由的名與實〉，《新路》，第一卷第二十一期（1948年10月2日），頁10。

⑧ 陳振漢：〈混合制度與計劃制度中間的選擇〉，《新路》，第二卷第五期（1948年12月11日），頁7。

⑨⑩ 負生：〈社會主義經濟需要計劃〉，《新路》，第一卷第十六期（1948年8月28日），頁4；5。

⑪⑫ 吳景超：〈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是可以分開的〉，《新路》，第二卷第五期（1948年12月11日），頁9；10。

⑬⑭⑮⑯⑰⑱ 春生：〈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要計劃〉，《新路》，第一卷第十六期（1948年8月28日），頁5；5；5；8；6。

⑲⑳㉑ 吳景超：〈論經濟自由——美蘇經濟制度述評之一〉，《新路》，第一卷第二十一期（1948年10月2日），頁5；11；11。

⑳ 羅隆基和王造時20年代先在美國研學政治學，後慕拉斯基之名赴英。羅隆基1925年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其導師為拉斯基。王造時1928年加入該學院作為研究員，跟拉斯基學習，研究政治思想與比較政府。儲安平是30年代去英國留學的，也拜拉斯基為師。

㉑ 文中提到的多位撰稿人均是30年代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的，主修的專業是政治學和經濟學。其中龔祥瑞1936年入該院，拉斯基是其督導員（supervisor），指點他研究行政機關內部的民主問題。吳恩裕也於1936年入該院，從拉斯基學習政治哲學，博士論文得到拉斯基的悉心指導，拉斯基還兩次慷慨解囊，幫助吳恩裕度過經濟困難，完成學業。

㉒ 邁爾（Thomas Meyer）著，殷敘彝譯：《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走向21世紀的社會民主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8-9。

㉓ 1939年夏歐戰爆發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奉命遷至劍橋，與劍橋大學合併上課。蔣碩傑1938年入該院，1941年本科畢業。1942年經哈耶克介紹回劍橋繼續攻讀經濟學，1945年通過哈耶克及希克斯（John Hicks）的主考口試，得博士學位。吳景超1923年夏赴美留學，入明尼蘇達大學，習社會學，1925年夏轉入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深造，三年後獲碩士及博士學位。劉大中1936年赴美留學，入康乃爾大學學習土木工程，獲碩士學位後改學經濟學，1940年獲該校經濟學博士學位。

㉔ 蕭乾針對劉大中〈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一文的討論文字，《新路》，第一卷第十三期（1948年8月7日），頁7。

衛春回 女，祖籍山西離石。副教授，現為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近年來在國內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著有《張謇評傳》一書。